



孔繁丰/纪亚光◎著

✿ 周恩来、池田大作 与中日友好

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池田大作 与中日友好

孔繁丰 纪亚光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孔繁丰, 纪亚光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7

ISBN 7-5073-2149-5

I. 周… II. ①孔…②纪… III. ①周恩来 (1898
~1976) 一生平事迹②池田大作一生平事迹③中日关系
—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①K827=7②K833.137=5③
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0463 号

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

著 者/孔繁丰 纪亚光

责任编辑/于丽娟

封面设计/爱咖设计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方方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880×1230mm 32 开 7.75 印张 150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5073-2149-5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从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和两国人民友好的大局出发，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积极推动双边友好往来，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今天我们总结回顾历史，不是要“煽起新的仇恨”，而是为了获取智慧和启迪，从而更好地把握今天的生活和未来的方向。我认为对“以史为鉴”的“史”，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它不仅是指两国之间长达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和近代五十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史，也应包括战后六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多年来两国政府、几代领导人和一大批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友好事业不断发展而不懈努力奋斗的历史。从当前呈现的研究情况

看，对于两千年和近代五十年历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一批成果，当然，依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和不足，今后还应继续努力。比较起来，对于两国政府和人民为发展中日友好的奋斗史的研究，就显得远为不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时间段看，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研究相对多些，而对于六十年代末以来，特别是中日复交以后的情况研究显得不够；从人物方面看，对于活跃在前台的人士关注较多，而对于由于种种原因一度隐于后台的人士关注不够；从对中日关系发展变化原因的分析看，多从中、日、美关系的视角入手，突出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欠全面，问题在于对于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战略思想及实践在其中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论证估计不够充分。

近些年来，涉及这段历史的一些内幕资料陆续公开，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相继发表了有价值的回忆文章，使得进一步认识这段历史，挖掘其深刻历史动因成为可能。其中，池田大作（1960—1979年任日本创价学会会长，1975年起任国际创价学会会长，1979年起任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在推进中日友好事业中的突出作用

及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尤为引人注目。加之，近几年来，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与日本创价大学和创价学会有关人士的合作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新发展。这些因素，促使我们把“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作为重点研究课题之一，力争在解决上述中日友好史研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他并强调指出：“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当代中日关系是历史的延伸，未来的中日关系是今天的继续。中日两国建立长期、稳定、健康的睦邻友好关系，不仅会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利益和幸福，而且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为了实现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双方都需要培养像老一辈那样在中日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有识之士和一大批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尤其是两国的青年，能不能正确对待两国

长达两千年的友好交流史和五十年日本侵华史，能不能正确总结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两国从敌对到友好的历史，能不能把两国老一代政治家开创的中日友好局面继续下去，成为关乎中日友好发展的关键。应该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真实的历史教育和引导他们，只有培养出真正相互信赖的新一代，中日友好事业才能得到继承和发展。如果本书的出版能在这一方面发挥一点积极作用，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欣慰和鼓舞！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中日两国有关人士的鼎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我们的研究工作，得到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处创新基金的立项支持。日本创价学会原副会长三津木俊幸先生，日本创价学会机关报圣教新闻社川崎一彦先生，日本创价大学高桥强先生、川崎高志先生，不仅多年来关注我们的研究工作，而且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同意我们使用他们收集整理的宝贵资料。没有他们的关照和帮助，本书写作是难以顺利完成的。日本白帝社小原惠子女士、山内広子女士帮助我们获得了出版资助。黄文农、龚娜将有关日文资料译为中文，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所有这些，我们都铭感

在心。

本书由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孔繁丰教授和纪亚光副教授合作完成。本书的写作提纲，由纪亚光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拟订初稿，经孔繁丰修改定型。本书写作分工如下：

孔繁丰：第一、四、五章

纪亚光：第二、三、六章

初稿写出后，由孔繁丰负责统一审读调整，修改定稿，纪亚光协助。

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书中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孔繁丰

2006年6月25日

于南开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一、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与实践	(1)
(一) 周恩来外交战略思想的形成	(3)
(二)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对 日外交思想与实践	(18)
(三) 创价学会进入周恩来视野	(48)
二、池田大作民间外交思想与实践	(61)
(一) 民间外交思想	(62)
(二) 民间外交实践	(71)
三、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89)
(一) 石破天惊的“池田倡言”	(90)
(二) 池田大作与公明党访华	(102)
(三) 周恩来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109)
四、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	(123)

(一) 亲切友好的会见	(124)
(二) 池田大作对缔结《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的贡献	(135)
(三)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中日 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	(150)
五、池田大作意义非凡的第七次访华	(162)
(一) 主持正义 打破僵局	(162)
(二) 受到中国领导人高规格接待	(169)
(三) 一次意义非凡的访问	(183)
六、继往开来世代友好	(192)
(一) 宝贵的精神财富	(192)
(二) 中国领导人对周恩来中日友好 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04)
(三) 池田大作为构建中日友好 “金桥”不懈努力	(212)
附录	(228)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 联合声明	(22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 友好条约	(232)
3. 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 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233)

一、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与实践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时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首都机场，洒满了明媚、宜人的金色秋光，插着中日两国国旗的专机在停机坪停下。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踏着铺有红地毯的扶梯，从飞机上走了下来，等候在扶梯旁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趋步向前，两国总理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田中首相实现了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此后，经过几天谈判，9月29日，中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从而为中日两国关系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这是中日两国领导人和广大人民长期培育、灌溉的中日友谊之花，在金黄色的秋天结出的丰硕果实。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友好关系，经历了民间往来、半

官半民、官民并举、正式缔结政府间友好关系等几个不同阶段。不经过新中国建立后二十多年中日两国各阶层各方面人士和两国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艰苦、曲折而又坚持不懈的巨大努力，中日恢复正常邦交和建立友好关系是不可想象的。其中，源远流长的人民传统友谊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巨大内在动力。而周恩来率先提出并身体力行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则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人民外交在国际关系史上创造了新的范例，是新中国整个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 and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历史中仅有的现象。

周恩来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外交家。他思想深邃，胸怀博大，才能非凡，风度超人。他从新中国诞生之日起直到逝世，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职务。他“在长达 26 年中，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① 周恩来在外交上不断有新的创造，他是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周恩来呕心沥血，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在中日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时，通过开展长期的民间外交，不仅使两国终于在 1972 年恢复了

^① 钱其琛：《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见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 页。

邦交，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两国人民的心灵中播下了友谊的种子，使它发芽生长，根深叶茂，开花结果，长久地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作用。

在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人们对周恩来怀着深深的敬意。他是一位感动过日本朝野许多朋友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中日恢复邦交时担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曾说：“周总理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可缺少的人物。也可以说，困难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得到实现，是因为周总理是中国方面的代表。”他还说：“周总理曾经留学日本，体验过日本的生活，也是一位完全了解战前、战时、战后三个时代的日中两国一切问题的人。我认为，周总理是为数不多了解日本和对日友好的人。”^①

评价一个人，需要把他的言行放到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一）周恩来外交战略思想的形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立起来了。

这一天，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负责组建各级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此后，他作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总

^① 《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5页。

理，前后长达二十六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新中国建立初始，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央人民政府面临着三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军事上，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解放全中国；经济上，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残破局面下，以极大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外交上，创造性地开辟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正确处理对外关系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使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大格局中站在恰当的位置，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作为新中国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刚过“天命”之年的周恩来面对着异常艰巨而繁重的任务，真可谓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千头万绪。其中，外交工作是他始终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他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高度的智慧和才能，勇敢地义无反顾地担当起这份重任。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和初期，他就与毛泽东一起致力于新中国外交基本方针和政策的制订。1949年1月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着重谈了新中国外交问题：“总的观念，百年受压迫，站起来了，民主联合。这个承认，那个承认，是旧观念。有些气概，才能摆好。”又说：国民党时期的“外交关系，不承认为好”。“外贸关系一件件做，不受束缚”。“总之，有利的解决，不成熟的过一

下解决。”^① 同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②

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政策，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项重要的外交方针。周恩来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的基础上，加以阐发，并且身体力行。

“另起炉灶”是毛泽东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的：“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

^①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9 年 1 月 8 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88～989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4 页。

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①

对于这个方针，周恩来作过深刻的论述：“‘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②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确定下来的，毛泽东在向大会的报告中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③

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作过很好的阐发：“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8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

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①

“一边倒”，是毛泽东 1949 年 6 月在其著名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来的。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②

对于这个方针，周恩来也作过很好的阐述：这个方针“宣布了我们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一边倒’的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③

历史地看，“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项方针，经毛泽东提出，周恩来加以进一步阐发，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外交思想，因而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导作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2~1473 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6~87 页。